

产品内分工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论东亚生产网络中中国的作用

杨学昌

(嘉兴学院商学院 浙江嘉兴 314001)

【摘要】 本文研究发现,产品内分工能够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竞争力,这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途径;产品内分工还可改变国际贸易收支核算的性质,这对贸易政策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东亚地区,与传统的普通贸易自由化相比,程度更深的经济一体化能够提升产品内分工的福利效应。

【关键词】 产品内分工 跨境外包 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产品内分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深入地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当代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性质(Hummels, 2001)。产品内分工是指将产品的生产分割为不同的阶段或零部件,从空间上分散到不同国家或地区组织制造、加工,形成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生产网络。

目前,有关产品内分工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其对发达国家国内收入分配与就业的影响,尤其缺乏对东亚生产网络中产品内分工对参与各国贸易竞争与福利的理论分析。本文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对中国等参与国的经济福利、国际贸易收支核算以及东亚地区一体化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中国在这一新型的国际分工格局下,调整和制定正确的产业与贸易发展战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产品内分工的主要特征

在产品内分工下,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从国外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零部件,并利用这些零部件生产出口的最终产品会对零部件出口国和本国的福利产生影响:

1. 如果资本(技术)密集型零部件来自发达国家,则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零部件生产商和最终产品生产商的利益会受到损害,而资本(技术)密集型零部件生产商的利益受到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来自中国的最终产品会减少他们在国内的市场份额,从而损害其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也会由于中国增加资本(技术)密集型零部件进口需求而获益。

2. 如果资本(技术)密集型零部件来自韩国等技术水平更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也在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用这些零部件生产的最终产品,那么他们也会出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利益变化,即由于中国的进入抢走了韩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韩国的利益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其净利益变化取决于中国从韩国进口的生产该出口产品所需资本(技术)密集型零部件的数量规模。

下面以我国为例,用图形来说明从国外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零部件会给中国带来成本节省效应和就业增加效应。图1说明了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零部件来自发达国家或技

术水平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节省效应。图中D是商品X国内需求曲线, $S_0(X_1+X_2)$ 是商品X完全在国内生产时的供给曲线。假定该商品由劳动密集型的零部件 X_1 和资本(技术)密集型 X_2 组成。 $S_1(X_1)$ 是零部件 X_1 供给曲线,反映了该零部件在商品X中所占的成本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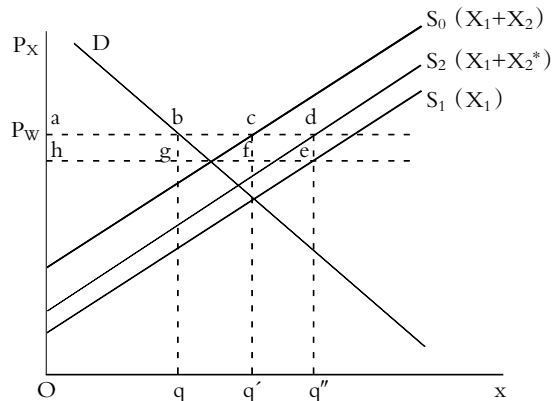


图1

在初始均衡中,中国生产ac数量的商品,其中ab供给国内市场,bc以世界价格 P_w 供给国外市场。假定中国采用产品内分工方式,从国外进口自己缺乏生产效率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零部件 X_2 ,其结果因零部件 X_2 的生产成本下降,供给曲线由 $S_0(X_1+X_2)$ 移至 $S_2(X_1+X_2^*)$ 。这里 X_2^* 表示零部件 X_2 的进口量。随着商品X生产总成本下降,国内生产扩张至d点,产量的增加部分全部出口。现在,商品X的总价值 $adq''o$ 由国内增加值 $heq''o$ 和国外增加值 $adeh$ 两部分组成。与没有进行产品内分工的情况相比,商品X产值的净变化等于 $feq''q'$ 与 $acfh$ 的差额。净变化数额可能是正数,也可能是负数。也就是说,参与产品内分工后,中国商品X的产量和出口值都将增加,而国内增加值则可能由于零部件 X_2 的进口而减少。在就业效应上方面,区域 $feq''q'$ 可以表示零部件 X_1 和最终产品X国内产值的上升所增加的就业数量,而区域 $acfh$ 则可以表示零部件 X_2 的外包所减少的就业数量。在一定程度上,由

于零部件 X_1 的生产和最终产品 X 的组装相对于零部件 X_2 是劳动密集型的,因此会有净就业机会增加。

以上结果是在假定零部件和最终产品世界价格既定的条件下得到的。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产品出口大国,当它将增加的产量销往世界市场上时,可能会导致商品 X 世界价格的下降,从而使产出均衡点沿供给曲线 S_1 下移,即商品 X 的出口量和出口值均会下降。而且,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还可能推动零部件 X_2 世界价格上升,引起供给曲线 X_2^* 左移。这同样也会减少商品 X 的出口量和出口值。

二、产品内分工下三国局部竞争均衡模型

中国从国外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零部件来升级其出口商品结构,不仅会对本国和零部件出口国的福利产生影响,而且也会通过与生产同类产品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对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全球价格和市场份额产生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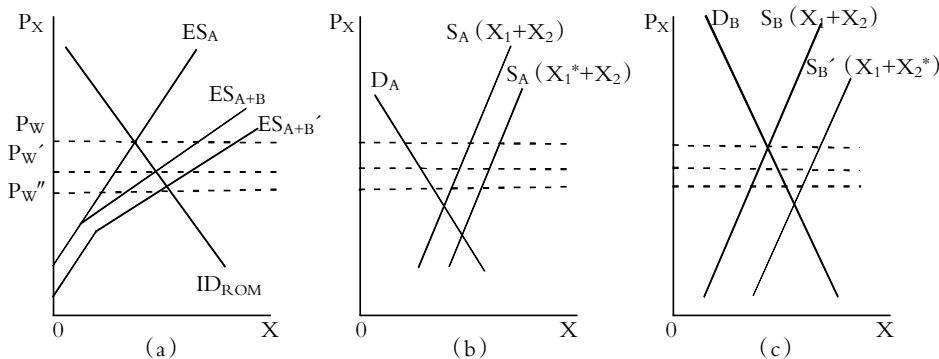


图 2

图 2 中,(b)与(c)分别反映了两个发展中国家(A 国和 B 国)对商品 X 的国内需求和供给情况。假定 A 国的技术水平比 B 国先进,在世界市场上对商品 X 拥有相对于 B 国的竞争优势。在商品 X 初始世界价格 P_W 下,B 国既不出口也不进口商品 X 。图 2(a)中 ES 和 ID 分别是世界市场上商品 X 的净出口供给曲线和净进口需求曲线。商品 X 的世界价格由这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在初始均衡状态,净出口供给(ES_A)仅仅是 A 国国内需求与供给的差额,净进口(ID_{ROM})则是所有进口国国内需求与供给的差额之和。

假定 B 国(如中国)通过从国外进口商品 X 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零部件来降低商品 X 的生产成本,其结果是国内供给曲线移至 S_B' 。现在,B 国也能进入商品 X 的世界市场。一个小国可以在商品 X 的初始世界价格下销售其全部出口产品,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进入世界市场则会使商品 X 的世界价格下降。如图 2 所示,中国的进入产生了一条新的由 A 国和 B 国的超额供给组成的世界供给曲线 ES_{A+B} ,它与世界需求曲线 ID_{ROM} 相交决定了比 P_W 更低的世界价格 P_W' 。世界价格的下降,会使 B 国出口量小于初始世界价格下的出口量,并使 A 国商品 X 的产出与出口量相对减少。而世界市场上各进口国的商品 X 进口量则会增加。由于 B 国进入商品 X 的世界市场,因而 B 国的生产者和所有的商品消费者的利益会增加,而 A 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者的利益则受损。

同样,A 国(或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削减开支、减少损耗或外包劳动密集型零部件来减少生产成本,增强竞争优势。其结果是产生了一条新的 A 国供给曲线 $S_A(X_1^*+X_2)$,括号中的第一项是零部件 X_1 的进口量。这将导致世界出口供给曲线移至 $ES_{A+B'}$,它与世界进口需求曲线 ID_{ROM} 相交决定了比 P_W 更低的世界价格 P_W'' 。由图中可以看出,随着世界价格的下降,A 国将夺回一部分被 B 国抢去的市场份额,B 国的出口就会下降。世界价格的下降增加了所有国家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减少了出口国生产者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A 国和 B 国外包不同的零部件,前者进口劳动密集型零部件,后者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零部件。这种生产贸易网络在东亚地区日益扩张。在该地区,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零部件;而韩国等先进国家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零部件。

在上述例子中,商品 X 的最终组装既可以在 A 国也可以在 B 国进行。然而,这种组装活动在下面两种情况下也可以外包出去。

第一种情况是,如果产品组装偏向劳动密集型,那么 A 国可以将组装活动外包给劳动力成本更低的 B 国而改善其福利。这时,A 国只专业化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零部件 X_2 ,并将其全部出口到 B 国,而 B

国则将零部件 X_2 与零部件 X_1 结合在一起组装成最终产品 X 出口到 A 国和其他国家。

第二种情况是,如果产品组装偏向资本(技术)密集型,那么 B 国可以将组装活动外包给技术水平更先进的 A 国而改善其福利。这时,B 国只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零部件 X_1 ,并将其全部出口到 A 国进行最终产品 X 的组装,然后再从 A 国进口商品 X 。在以上两种情况中,无论是 A 国还是 B 国,其进口的最终产品 X 中都包含了部分国内增加值,而这对国际贸易平衡核算和人民币升值的相关经济效应会产生重要影响。

三、产品内分工与国际贸易平衡核算

当存在零部件外包时,明确进口零部件的最终用途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利用进口零部件生产的产品仅在国内消费,那么可以采用传统方法进行国际贸易平衡核算。但如果利用进口零部件所生产的产品用于出口或出口的零部件包含在进口的最终产品中时,则采用传统方法进行国际贸易平衡核算可能会产生误导。当一国某种商品进口大幅上升时,该国政府如果尚未弄清进口量猛增的真实原因就贸然采取保护措施,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进口增加可能存在以下三种形式:一是传统意义上的进口增加,进口产品既不包含本国出口的零部件,也不用于生产出口产品;二是进口品中包含了部分本国生产出口的零部件;三是增加的进口产品是用于生产更多出口最终产品。第一种形式的进口增加显然是不利于本国的,因

为它会替代国内产出和就业，而后两种形式的进口增加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利的，因为它们往往带来出口大幅上升。这些细微差异增加了贸易政策制定的复杂性。

随着产品内分工的迅速发展，有必要对商品出口总价值和出口增加值或进口总价值和进口增加值都加以考察，以确定进口零部件在本国出口产品中所占比重，或本国出口的零部件在本国进口的最终产品中所占比重。这些考虑和当前关于人民币的估价及其升值的可能影响的争论有关。目前，由于美中巨额贸易逆差，美方强烈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民币升值会提高中国商品的美元价格而降低美国商品的人民币价格，从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需求而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需求。但是，产品内分工和全球生产体系的出现，对这种认识提出了挑战。在东亚产品内分工体系中，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最终产品，往往使用了大量从韩国与日本等国家或地区进口的零部件。当人民币价格相对于美元价格上升时，中国出口商品的美元价格是否会提高将取决于人民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是否升值以及升值幅度的大小。

四、产品内分工与区域一体化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产品内分工使比较优势由产品层面深入到零部件层面，从而比较优势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从整体上提高了各参与国的整体福利。然而，在特惠国关税贸易下，产品内分工的福利效应却是模糊的。

特惠贸易自由化有两种：一种是特惠贸易区(PTA)，在PTA中，贸易自由化仅仅意味着关税和配额等边境管制的削减和消除；另一种是经济一体化区域(IEA)，IEA是比PTA更高级的经济自由化形式，包括对关税、FDI、居住权和人口流动等限制的取消，它可以为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条件。尽管近几年PTA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但当特惠贸易协议对第三国有明显歧视时并不必然带来贸易创造。而IEA则有可能带来更多的贸易创造。

这两类特惠贸易自由化的福利差异可用图3说明。在图3中，一国初始的生产均衡点与消费均衡点分别是 Q_0 和 C_0 。假定在进口X产品时该国征收最惠国关税(MFN)，关税水平为X产品的世界价格 P_w 与国内相对价格 P_d 之差。再假定该国加入PTA，其贸易伙伴国是X产品的低成本生产国，此时，特惠贸易区内部的相对价格将移动到 p_{ta} ，该价格低于初始的包含了关税的国内价格 P_d ，但高于世界价格 P_w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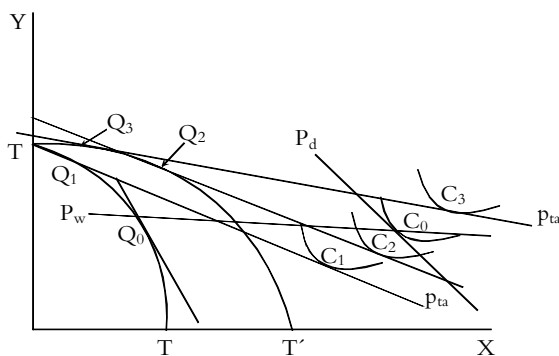


图3

此时，X产品进口增加，国内生产均衡点移到 Q_1 ，而国内消费均衡点则移到 C_1 。很显然，这个特惠贸易区是贸易转移与福利降低的安排，因为消费均衡点由初始 C_0 移到了较低的无差异曲线 C_1 上。现在假定在特惠贸易区下，两国进一步提升经济一体化程度，由特惠贸易区(PTA)进一步发展经济一体化区域(IEA)，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和贸易伙伴国企业在本国投资办厂。并假定该国进口部门X采用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从贸易伙伴国进口生产X的技术密集型零部件。这一变化相当于X产品部门出现了技术进步，使得生产可能性曲线TT沿X轴外移到TT'。如果相对于贸易伙伴国该国是个小国，则贸易区内的相对价格不会发生变动，生产均衡点与消费均衡点移到 Q_2 与 C_2 ，和未发生产品内分工时相比，国家福利有所提高。如果相对于贸易伙伴国，该国是个大国，与特惠贸易区下的水平相比，X产量的增加会使其价格下降，价格线旋转到 p_{ta} 。这一价格变化将引起生产均衡点与消费均衡点移动到 Q_3 和 C_3 ，显然该国整体福利水平进一步提升。

中国凭借强大的制造力，在东亚生产网络中可以发挥引领作用。相对于普通的贸易自由化，更深程度的经济一体化，其福利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在东亚地区，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亚产品内分工生产网络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Kimura和Ando(2003)指出的，美国的跨国公司积极介入东亚生产网络的构建，日本的跨国公司则在东南亚国家生产网络的形成中发挥了资金、技术优势，而新加坡等其他国家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通过垂直FDI，纷纷将其劳动密集型零部件转移到中国生产。这表明特惠贸易区(PTA)需要进一步发展成经济一体化区域(IEA)，将单纯的贸易自由化提高到包含对投资自由化与产品内分工生产的促进，为东亚地区的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

五、结论

本文集中研究了以零部件跨境外包为主要形式的产品内分工对贸易和福利的影响。产品内分工为发展中实现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进程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产品内分工依然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只是比较优势已由最终产品层面拓展到零部件层面。

产品内分工意味着一国出口可能包含国外增加值，而进口可能包含其国内增加值。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收支平衡核算需要考虑到这些贸易流量的交叉，政策制定者也需要对贸易流量的变动给予准确的反应并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

产品内分工形成与发展需要的条件要高于传统贸易自由化。具体而言，产品内分工需要与贸易伙伴国进行程度更深的经济一体化。产品内分工在决定地区贸易协议的福利改善效应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因为由产品内分工形成的更深程度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协议具有明显的福利促进效果。

主要参考文献

1. Arndt S., W. Super-Speci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1999; 4
2. Dani Rodrik.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NBER Working Paper, 2006; 11